
社交媒体对日本政治决策过程的渗透

——基于对“#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事件的考察

潘妮妮

内容提要：2020年5月，社交媒体“推特日本”上发生了一起以“#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为主题的政治舆论事件，影响到政府相关政策的走向，反映了社交媒体环境对日本政治决策过程的渗透。这一“渗透”同时表现出日本社交媒体政治舆论的独立性和依附性。“独立性”在于，网络舆论内容偏离了政党的规范议程，其情感导向与传统政治决策过程重视的程序理性导向相冲突；同时，网络舆论的核心推动力量是由多个政治边缘群体或非政治群体组成的临时的松散同盟。“依附性”在于，尽管网络舆论导致了政策的改变，但并不是决策者直接回应网络“民意”，而是网络舆论压力激化了传统政治决策过程中参与群体之间的固有矛盾，临时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力量分布状况，从而影响到政策走向。这种“渗透”中的独立性和依附性的并存，表明社交媒体环境对日本政治决策过程还未形成结构层面的挑战，但会显著增强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 社交媒体 政治决策过程 政治渗透

作者简介：潘妮妮，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7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20)06-0109-17

就如麦克卢汉所言，“一旦一种新技术进入一种社会环境，它就不会停止在这一环境中渗透，除非它在每一种制度中都达到饱和”。^①网络技术亦是如此，会“对人的交往模式进行重组”。^②随着社交媒体生态的全面扩张，“网

^①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26页。

^② 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络政治（参与）”已经成为政治决策过程中无法忽略的独立影响因素，也是分析当代政治变迁的重要切入点。^① 例如席卷欧美发达国家的“#Me Too”^② 运动，或是发生在一些所谓的“转型社会”的草根运动，社交媒体在各自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对政治议程设置、社会动员和政策走向都产生了影响。在日本，“以东日本大地震为契机，‘推特’（Twitter）的普及率激增”，^③ 社交媒体对日本政治的影响也为人们所认识。日本学界已有研究案例更多显示的是现有的组织性政治力量如何主动利用网络作为辅助性工具，助推竞选活动、抗议活动或出台右倾的对外政策等，^④ 换言之，更多关注的是网络舆论的形成与既有政治群体有意识调控的关联。而在2020年5月，社交媒体“推特日本”（Twitter Japan）上出现了一起“#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事件，被政界和主流媒体均视为“异例”。不到三日的时间内，围绕该事件在推特上已有超过500万条推文，最终统

① 把互联网作为一种独立的环境因素来讨论它对现代政治生态影响的著作，参见：Moises Naim, *The End of Power: From Boardrooms to Battlefields and Churches to States, Why Being In Charge Isn't What It Used to Be*, Basic Books, 2013；尼尔·弗格森：《广场与高塔：网络、阶层与全球权力竞争》，周逵、颜冰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

② 其中的“#”意为“话题标签”，英文表达为“hashtag”，用户附加此标签及话题名称表示参与该话题。

③ 宮田加久子・池田謙一・山本仁志・小川祐樹「インターネットの情報が政治的議論に及ぼす結果についての実証的研究」、電気通信普及財団、<https://www.taf.or.jp/files/items/551/File/P011.pdf> [2020-04-25]。

④ 从笔者的梳理看，相关案例主要分布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将社交媒体视为政党选举的辅助工具的研究，2013年日本解禁网络公职选举活动，相关的案例研究较为丰富。参见：湯淺壘道「インターネット選挙運動と公職選挙法」、『選挙研究』第30卷第2号、2014年、75—90頁；杉山あかし「第1回ネット選挙—2013年参議院選挙の実証的研究—」、『比較社会文化』第20号、2014年、11—29頁；河井大介「ネット選挙解禁におけるメディア利用と政党支持—2014年衆院選調査から—」、『社会情報学』第4卷第3号、2016年、1—13頁；吉見憲二「選挙期間中の各政党におけるソーシャルメディアの利用傾向」、『社会情報学』第4卷第3号、2016年、15—29頁；吉見憲二「2014年衆議院議員選挙期間中の候補者におけるTwitterの利用傾向」、『情報通信学会誌』第34卷第4号、2017年、155—165頁；三輪洋文「Twitterデータによる日本の政治家・言論人・政党・メディアのイデオロギー位置の推定」、『選挙研究』第33卷第1号、2017年、41—56頁；鳥海不二夫・吉田光男「2017年衆院選挙における政党公式アカウントフォロワーの分析」、人工知能学会全国大会論文集（CD-ROM）2018。其次是关于执政党和内阁利用网络来推行右翼国家主义政策的方式的研究，参见：Fabian Schäfer, Stefan Evert and Philip Heinrich, “Japan’s 2014 General Election: Political Bots, Right-Wing Internet Activism, and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s Hidden Nationalist Agenda”, *Big Data*, Vol. 5, No. 4, 2017, pp. 204—309；ロバート・ファーヒ「SNSデータから『有権者の本音』を推論できるか?—2017年総選挙を事例に—」、『よろん』2019年第123巻、65—70頁。最后是关于进步系政治和社会力量将网络作为动员和联系渠道的研究，参见：山腰修三「デジタルメディアと政治参加」、大石裕編『デジタルメディアと日本社会』、学文社、2013年。

计数量超过 700 万,^① 使该事件热度异常, 在数日内压倒同期的社会和娱乐类新闻, 成为热门话题。此外, 该抗议事件部分实现了目标, 与近年来日本效果不彰的政治抗议活动形成强烈对比。本文拟通过追踪该事件全过程, 剖析日本社交媒体对传统政治决策过程的挑战, 以为揭示现代日本政治稳定性的机理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一、“#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事件及其特征

2020 年 1 月底至 2 月间, 日本内阁决定推迟时任东京高等检察厅厅长黑川弘务的退休时间, 并为此欲变更《检察厅法》和《国家公务员法》修正案的法律解释, 即获得内阁法务大臣的认可后可特别推延检察系统高级官员的退休时间。在野党质疑这是安倍内阁为推举黑川为后任国家检察总长铺路, 因此对该行为的程序正当性加以批判。^② 同年 5 月 8 日夜, 一条关于“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的“话题标签”开始在网络上扩散, 主旨是反对自民党在春季国会强行表决“检察厅法修正案”, 反对政府任命黑川为国家检察总长。网络抗议引发朝野政治力量和主流媒体的普遍关注, 最终自民党放弃在春季国会上表决该法案, 随后黑川因被曝光个人丑闻而辞职, 抗议舆论即趋于平息。

“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事件由于矛头指向自民党内阁, 加之得到了进步系在野党和社会团体的积极响应, 因此其被看作是传统的进步系政治抗议的延伸。例如《产经新闻》就刊文指出, 该事件使在野党“对政权取得了久违的正面批判成果, 增强了自信”。^③ 《朝日新闻》也使用了比较传统的“内阁”对“民意”的叙事方式, 将该事件总结为“(内阁) 想要强行通过备受质疑

① 有数据分析指出, 仅有 5% 上下的推文属于恶意的反复投稿或者机器自动投稿的“垃圾”内容, 故本文认为推文数量基本反映了网络参与的真实广度。参见:「『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に投稿されたのは『ほとんどがスパムツイート』だったのか?」、ITmedia、2020 年 5 月 12 日、[https://nlab.itmedia.co.jp/research/articles/22436/\[2020-05-20\]](https://nlab.itmedia.co.jp/research/articles/22436/[2020-05-20])。

② 参见:「枝野氏『黒川検事長定年延長は脱法』政権寄り人事批判」、『北海道新聞』2020 年 2 月 2 日;「社説 検事長定年延長/政治の介入で独立が揺らぐ」、『河北新報』2020 年 2 月 8 日;「共産『検察人事への露骨な介入』…国家公務員 65 歳定年法案が審議入り」、『読売新聞』2020 年 4 月 16 日。

③ 「久々の戦果、野党に自信、検察定年延長見送り」、『産経新聞』2020 年 5 月 18 日。

的法案而引发舆论上的反抗，被迫重做考量”。^① 但笔者认为，该事件的结果客观上虽然对传统的进步力量有利，但不等于它从属于进步力量，而是有着独立的内容和形成逻辑，这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

首先，网络议题与在野党派议题尽管在事件爆发后合流，但在之前是分开进行的，在野党和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并不显著地先于网络舆论。传统的党派力量率先触及了这一议题，但其抗议的重点是安倍内阁变更《国家公务员法》解释、干预人事任命的程序问题，而“检察厅法”的修正并不是其关注的核心。而且，由于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该议题并未被纳入在野党的核心政治议程，没有进行社会动员，进步媒体也没有对之有多少关注。直至自民党将《检察厅法》修正案与《国家公务员法》修正案打包提交众议院内阁委员会的 5 月 8 日，“推特日本”上一位受关注度不高的个人用户首次发表带“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标签的推文，其后推特舆论“爆发”，在野党、主流媒体和社会团体跟进，才使“检察厅法修正”这个原本居于边缘地位的概念成为事件的核心象征。譬如，4 月 6 日，日本律师联合会曾发表正式反对文书，题为“要求撤回延长检察长职务时间的内阁决议，反对《国家公务员法》部分修正的会长声明”；而 5 月 11 日，大概是受“#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事件影响，该会又发表了“再次反对‘检察厅法’部分修正的会长声明”。因此可以说，尽管进步力量更早触及了这个议题，但使之进一步成为公共事件则是通过社交媒体引领实现的。

其次，从纵向比较看，该事件的规模远超以往在野党社交媒体的动员水平。5 月 8 日至 11 日（也有“5 月 10 日晚”一说），带“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标签的推特数量达到 500 万条。如果考虑到还有未带这一标签的相关内容，其实质传播规模可能更大。^② 有媒体指出，在一般政治事件中，例如 2019 年 7 月的参议院选举，成为热搜的政治话题也不过“数万到 10 万（推文）的水平”。^③ 有舆论调查从业者更指出，政治热点话题的相关推文达到数

① 「政権また世論読み違え『保守層まで…』 検察庁法改正案」、『朝日新聞』2020 年 5 月 19 日。类似的态度还可参见：「『ツイッター世論』政権直撃『怒りの声』異例の急拡大 検察庁法改正案見送り」、『毎日新聞』2020 年 5 月 18 日；「『安倍 1 強』政権に末期感 与党内、自民から公然と異論 公明も『信用されない』」、『北海道新聞』2020 年 5 月 24 日。

② 「『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500 万ツイートを集めた『最初の 1 ツイート』はどのように広まったか?」、ITmedia、2020 年 5 月 11 日、[https://nlab.itmedia.co.jp/research/articles/22171/\[2020-05-20\]](https://nlab.itmedia.co.jp/research/articles/22171/[2020-05-20])。

③ 「#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 盛り上がりの背景に『共通の怒り』」、『毎日新聞』2020 年 5 月 11 日。

百万条，仅靠支持特定政党的“党派集群”^①来制造是不可能的，其显示了“‘非政治层’的贡献巨大……反映了自下而上（的特征）”。^② NHK的报道也显示了事件参与者规模的相对庞大，只投稿一次的用户数达到了全体用户数的80%，转发10条以下的用户数有100万人以上。^③有学者进一步分析认为，参加该事件的实际用户数达59万人之多，其中32万用户发表原创推文56万条，转载推文则有417万条。^④与庞大的推文数量相对照，同期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也显著下降，^⑤日本主流媒体普遍认为两者存在关联。

最后，该事件中体现的议程框架（issue framing）^⑥具有强烈的情感导向，与朝野主要党派和主流媒体倡导“理性”和程序导向存在差别。如前文所述，“#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这个口号的设定本身已经偏离了原本国会内政党争议的核心内容，说明这一网络抗议活动本身并不是建立在理解和认同在野党的“政治理性”——例如对“法律程序”的强调——基础上的，而是有自己的认识逻辑。“政治理性”框架下对该事件的认识可以参考《朝日新闻》引述（除共产党以外的）在野党高层和退休检察官等专业人士的观点所做的总结：第一，不反对修正案本身延迟退休的内容，但认为这样做会给政府干预人事留下可操作空间；第二，不是针对黑川弘务，而是对“延迟退休”的法律解释和程序不合规的批判；第三，即使依照政府的辩护，它拥有影响检察厅人事的法定权力，但“政府不介入检察官人事是一直以来得到严格遵守的惯例”。^⑦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朝日新闻》对该事件持明显支持态度，但它

① 日文为“党派クラスター”。

② 「#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 盛り上がりの背景に『共通の怒り』」、『毎日新聞』2020年5月11日。

③ 「検察庁法改正めぐる投稿 その実態は 専門家がデータ分析」、NHK NEWS、2020年5月16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00516/amp/k10012432561000.html> [2020-05-30]。

④ 「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ツイッター500万件超…転載で関心拡大」、『読売新聞』2020年5月15日。

⑤ 参见：「内閣を『支持しない』が『支持する』を上回る NHK 世論調査」、<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00518/amp/k10012434921000.html> [2020-05-18]；「検察庁法改正『反対』64% 内閣支持率33% 朝日調査」、<https://www.asahi.com/amp/articles/ASN5K66V9N5HUZPS003.html> [2020-05-17]；「内閣支持率27%に急落 黒川氏『懲戒免職にすべきだ』52% 毎日新聞世論調査」、<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5494515f46e84d63a221e7980aff555987b9a862> [2020-05-23]。

⑥ “框架”为传播学概念，指在信息传播中组织参与者思想的特定的宏观组织原则、主导角度或者说阐释图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参见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⑦ 三輪さち子「異例の抗議なぜ続出？検察庁法改正案、論点オールまとめ」、『朝日新聞』2020年5月17日。

更希望引导舆论进入“政治理性”轨道，强调在政治实践层面政府对具体规则、程序和惯例的遵守，给事件解决创造一个可协商的空间。

而在现实中，网络舆论框架的“斗争性”往往大于“协商性”。有研究者指出，“过去基本没有政治内容投稿短时间内吸引数十万用户参加的情况。一般来说，赞成、反对两方的内容都可以看到，但仅一方意见的内容被扩散，是这次事件的特征。”^① 笔者对点赞量超过 500 次的热门推文进行考察后发现，这种“一边倒”具体表现为，“#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舆论所涉及的问题界定、阐释、评估和应对都重点放在“原则”和“价值”上，使用没有争议的、情感化的政治语言来串联整个事件，从而使“非政治层”的充分参与成为可能（参见表 1）。

表 1 “#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事件中热门推文的内容分类分析

分 类	考察内容	框架表现
问题界定	对“抗议”话题涉及的问题范畴的框定	相关法案（《检察厅法》与《国家公务员法》）的修正扩大了内阁“恣意”干预检察机关人士的权限；特定政治家集团（更具体则直接使用“安倍晋三”/“安倍政权”）是借修正法律来推举对自身有利的检察总长人选（黑川弘务）；执政党欲在 2020 年 5 月国会上强行通过修正案
因果阐释	对抗议行为动因的解释	维护“国民主权”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反对行政力量对检察权的“干预”；对黑川弘务本人“不称职”证据的挖掘
道德评估	对赞成和反对意见的评价方式	强调抗议与“左右”无关，是对一般性道德的追求；提及反对意见，一般与“右翼”、“安倍支持者”和“政治冷漠（不承担‘公民责任’）”等关键词关联
处理意见	提出的行动目标和诉求	短期目标：罢免黑川弘务；阻止“强行表决” 长期目标：在秋季国会促成该修正案成为“废案”；安倍晋三下台

资料来源：基于作者对热门推文的追踪，依据检索排序、关注用户推送，以及资讯网站的整理而成。表中内容的分类方法来自被普遍应用的恩特曼（Robert. M. Entman）理论，参见：Robert. M. Entman,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3, No. 4, 1993, pp. 51-8。

由上可见，社交媒体舆论对传统的政治决策过程造成了巨大冲击，形成了对政治决策过程的直接渗透。此次事件中，从议题的选择到最终形成的议程框架，都偏离了传统政治决策过程的模式，尤其是它直接改变了原本主要

① 「検察庁法改正めぐり投稿 その実態は専門家がデータ分析」、NHK NEWS、2020 年 5 月 16 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00516/amp/k10012432561000.html> [2020-05-30]。

由传统政党力量调控的议题优先顺序、抗议规模和行动框架的“理性协商”导向，对政治决策过程形成刚性的外部压力。而且，在该事件中，推动舆论形成的核心群体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边缘群体或者“非政治层”，他们通过对网络的深度参与获得了制造舆论的“反向优势”。

另一方面，该事件中的社交媒体舆论又表现出明显的“依附性”特征。首先，“爆发”的议题类别仍属于传统政治范畴，而不像同为发达国家的欧美已将很多边缘政治议题推入主流（如“#Me Too”这类身份政治议题）。其次，虽然内阁最后的政策变更看上去与社交媒体舆论的诉求一致，但从具体过程看，舆论压力是先影响到了传统的政策参与群体，造成其内部分化，或主动或被动地对舆论进行有选择的吸纳和利用，然后再迫使政府变更政策。也就是说，政府实际直接回应的是传统的体制内压力，而非社交媒体舆论本身。

总之，在“独立性”和“依附性”的共同作用下，日本的社交媒体网络虽然没有对传统政治决策过程的基本结构形成挑战，但它的存在可能会使超出传统政治理性测算的舆论压力被持续生产出来，这将显著影响传统政策参与者的行为选择，从而增加政治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二、边缘群体的舆论制造能力及其局限性

接下来将讨论，在这个事件中，社交媒体舆论压力背后的推动者是谁？社交媒体舆论的爆发和影响是否意味着未来会有新的行动者加入政治决策过程中来？

通过对“#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事件的考察可以发现，其中确实出现了新的行动者，但他们并非是一个共享特定组织关联、明确利益诉求或行动纲领的力量单元^①，而是多个类型的网络深度参与者在“抗议检察厅法修正”这一特定议题下的临时互动。网络核心参与者的多样化在推文数据的增长趋势中有直观体现。根据软银旗下资讯网站 ITmedia^② 的统计，从5月8日到5

^① 值得说明的是，由于社交媒体网络的匿名性特点，在网络政治的潜力日渐被认识的今天，现实中确实存在基于有组织的幕后分工和计划之上的虚构的“多元参与”事件。这给研究者带来困难的同时，也促使我们采取更谨慎的态度。就本文所涉事件而言，首先从目前的公开信息看，后文所述三类活跃用户之间未有已知的组织关联，其中，仅有政党用户内部存在已知的组织和行动上的合作，但从活跃的明星用户的背景和日常行为看，绝大多数不存在显著的政治组织关系，通过其他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特征也不明显。另外，从三类用户的行为方式看，体现的是各自的日常倾向和习惯，在话题爆发过程中没有表现出有意识相互配合的色彩——只有在话题爆发之后，部分活跃分子间出现了一些公开的跨界呼应。

^② 网址为 <https://www.itmedia.co.jp/>。

月11日,该话题推文数量的增长并非表现为由中心向边缘扩散的均衡趋势,而是至少分成三个阶段,即5月8日晚的发生期,9日和10日分别出现两次数量激增,后者的增长规模又显著大于前者。而且,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了三个类型的参与者——“女性主义者”用户、进步系政党用户、娱乐明星用户——的中心作用。^① 具体来说,首先是女性主义者独立发起了话题,然后进步系政党用户使用规范的政治语言对话题进行阐释,把女性主义者的个人化表达转化为一种集体性表达,最后,娱乐明星用户的参与极大地提升了大众关注度和参与积极性。三类用户的分散角色共同促成了该事件的大规模爆发。

这些新的行动者多属政治边缘群体或“非政治群体”,他们原本对传统政治决策过程和主流舆论的影响较小,但凭借新媒体环境参与获得反向优势,从而有可能“在话语、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等领域得到权力和能力的提升”。^②

(一) 边缘群体参与的资源:反向优势

首先,话题的发起者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作为当代西方社会后现代“身份政治”的重要主题,^③ 在日本的主流政治过程和社会意识中是一个异质的存在。^④ 社交媒体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积极活动的主阵地,相应地,女性主义话语在网络文化中的影响力就大于在现实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⑤

其次,在话题发起后,进步系政党用户和大众娱乐明星用户发挥了关键的扩散作用,分别把相关推文数量提升到十万和百万级别。政党用户群体内部,在现实政治决策过程中较为边缘化的“日本共产党”用户在该事件中的积极性和收获的热度大于更强调“协商”性程序的立宪民主党和社民党用户。而在日本共产党用户内部,网络影响力也并不完全与其现实地位成正相关,一些普通议员由于发表内容的丰富和形象风格上的网络亲和力,可以获得与

① 「『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500万ツイートを集めた『最初の1ツイート』はどのように広まったか?」、ITmedia、2020年5月11日、[https://nlab.itmedia.co.jp/research/articles/22171/\[2020-05-20\]](https://nlab.itmedia.co.jp/research/articles/22171/[2020-05-20])。

② 丁未:《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0期,第76—81页。

③ 关于身份政治的问题,参见徐彬、卜永光:《新身份政治兴起及其对西方国家治理的挑战》,《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第83—93页。

④ 简单来说,女性主义主张从女性的文化身份出发来争取政治承认,而主流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女性问题主旨是将女性作为劳动者/母亲来给予经济补贴。日本本土化的性别文化与西方式女性主义近年来也多有冲突。

⑤ 例如,受美国“#Me Too”运动影响,日本社交媒体网络上也发起了反对职场女性歧视的“#Ku Too”话题,在一年间获得了约35万的推文,与同时期的网络政治议题相比,亦可说有一定热度。参见:「『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500万ツイートを集めた『最初の1ツイート』はどのように広まったか?」、ITmedia、2020年5月11日、[https://nlab.itmedia.co.jp/research/articles/22171/\[2020-05-20\]](https://nlab.itmedia.co.jp/research/articles/22171/[2020-05-20])。

党派核心人物同等甚至更高的热度；普通党员或者党外支持者也会因为参与的积极性或者提供了网络接受度高的内容——例如对事件的关键点进行简练归纳、创作事件相关的艺术作品等——而成为话题传播的重要节点。

再次，虽然娱乐明星在理论上是距离主流政治决策过程最远的群体，但对于推文数量扩散的直接贡献最大。这是由于社交媒体日常主要是娱乐空间，娱乐明星相比政治精英拥有更高的日常关注度和更广泛的支持群体。5月10日，在若干娱乐明星参与该事件后，相关推文数量迅速扩大到百万级别。例如，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热度最高的一条推文截至6月1日有4.3万个赞和2.2万条转发，是政党用户中的佼佼者；而娱乐明星的热门“#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推文最低也有上万个赞，最高的点赞数可达到十万级别。

（二）舆论的建构：松散联盟的行动与互补

如前所述，事件的发起和大规模扩散依赖的都是传统政治决策中的边缘群体，他们通过网络参与自我赋权，在互动中结成了一个抗议联盟，共同构建了网络舆论的巨大辐射力和冲击力。但是，这个同盟对传统政治决策过程的作用也是双向的。一方面，此事件证明了分散的边缘群体的动机、优势资源和行动方式完全有可能形成互补（参见表2），从而爆发出超越其理论上政治地位的巨大能量。另一方面，多样化的动机和行为方式决定了这些参与者间虽会临时共享原则性情感，但很难建立持续性的组织联系和共同行动，也很难推出统一的“代表主体”来实际参与政治决策过程中的日常博弈。接下来将具体分析参与者的网络政治角色如何有效互补，从而建构了独立于政治决策过程的网络舆论。

表2 松散联盟中的角色互补

	动机	优势资源	行动
女性主义者	日常参与的延伸	“弱小个体”的抗争正义	制造话题标签； 奠定情感基调
在野党	对执政党的政治抗议	一定规模的固定关注者（十万级别）；支持者的组织度；政治抗议的实践经验；使用规范政治语言的能力	带来第一波大规模扩散； 提供规范的集体语言表述； 以“参与者”的身份出现， 强调政治“原则”
娱乐明星	个人政治诉求；朴素正义感；追随/制造热度的营销需要；与粉丝或其他明星的互动需求；对质疑的抗辩	大规模的固定关注者；与大众之间有“普通人”的共情	带来第二波大规模扩展； 制造衍生议题，引发广泛的“非政治层”对政治议题的移情

资料来源：在观察表1依据的热门推文内容的基础上，针对其中发挥较大影响的发布者的日常身份、关注者数量、事件中的行动方式、影响效果进行综合考察，制作此表。

1. 女性主义者的角色

对发起话题的女性主义者而言，这是日常参与行为的自然延伸。女性主

义者具有自觉的“边缘身份群体”意识，强调通过日常不断的政治表达来打破现代政治在文化层面的霸权（hegemony），沟通“日常强烈关心政治的人的世界”与“迄今为止未对政治发言的人的世界”。^① 因此，据发起人自述，“#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话题的发起是在收看 NHK 国会现场转播时的一个偶然的反馈。^② 她最初的推文如下：

“一个人的抗议#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与左右无关。不想生活在不能正确制裁罪行的国家。如果这个法律得到通过，那么‘正义将取胜’这种台词会成为过去，警察和法律题材的电视剧也无法成立。请绝对不要让它通过。”^③

从以上文本看，该女性主义者对国会政治信息的提取方式和使用政治语言的能力都不够“规范”。如前文所述，“#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这个提法实际偏离了通常国会议程内容。但这个简化乃至可能是“错误”的“抗议”表达方式从事后来看，比进步系政党主导的“《国家公务员法》修正的法律解释变更程序不合法”这种严格的理性表述更能起到动员大众的作用。女性主义者极富情感色彩的表达，展现了一种属于“弱小个体”的行为正当性。

2. 进步系政党的角色

5月9日，话题相关推文迎来第一次数量飞跃，达到40万条。在这个过程中，拥有十万级关注度的在野党认证账号^④上，关于该话题的推文都获得“万”级别的转发，表现出强势的话题推动效应。^⑤

在野党有明确的抗议执政党的政治动机，同时以线下的组织和政治实践为基础，在网络上也有比较强的组织联系和政治抗议动员的实践经验。同时，在野党用户能使用规范的政治语言，把女性主义者富于个人情感的表达转化为集体性的“公共议程”。考察这一时期及之后的热门推文，“民主主义”“三权分立”“内阁权力”“程序”等现代政治制度中已知的正式政治概念占据了关键位置。

然而，政党的行动并没有脱离网络环境特色的约束。就整个过程而言，

① 笛美「#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 デモで知った小さな声を上げることの大切さ」、2020年5月11日、<https://note.com/fuemi/n/n56bdee1d8725>[2020-05-20]。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譬如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15万关注者）、社民党党首福島瑞穂（21万关注者）和立宪民主党（18万关注者）等。

⑤ 「『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500万ツイートを集めた『最初の1ツイート』はどのように広まったか?」、ITmedia、2020年5月11日、<https://nlab.itmedia.co.jp/research/articles/22171/>[2020-05-20]。

政治党派用户成为传播的中间环节，其角色是扩散一个女性主义者“自发”制造出的话题。从党派用户的发言中可以看到，他们有意识地把自己放置到“参与者”的位置上，选取能够适应网络大众情感需求的政治语言，也就是更能表现“社会斗争原则”而非“国会协商（妥协）方案”的语言。

(1) “为治理新冠肺炎疫情正需要朝野政党最大限度协作时，要强行通过一个危害宪法三权分立且并非急需的法案吗？执政党和政府应改变强硬姿态！”^①

(2) “检察厅被赋予了可以逮捕时任总理的强大权力，如果内阁可以介入检察厅人事，则日本不可再称法治国家。虽然不能立即组织大型集会，但言论自由是存在的。作为主权者发声吧！”^②

比较志位和夫5月9日发出的以上两条推文可知，两条推文都偏向于原则叙述，但前者限于党派政治角色，后者明确定位为“（国民）主权者”；前者偏向具体的议会政党行为原理，后者则主要阐述政治价值。从推文点赞量来看，后者获得的认同度为前者的两倍。而且，两条推文的热度都超过了该用户日常推文的平均热度，也反映出党派用户是“参与”和“适应”，而非“主导”了该事件。

3. 娱乐明星的角色

5月10日，娱乐明星用户的介入，使“#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推文数当日暴增至400万条。如前所述，明星推文的热度和扩散能力都远超党派政治家。同时，明星参与和推文的暴涨又为大众传媒报道提供了切入点，是网络议程影响主流媒体议程的直接桥梁，进一步加强了事件的社会影响力。^③但相比前两者所拥有的比较单一和明确的动机，明星的参与动机更为复杂。除少部分有积极参与政治经历的明星外，大部分的推文文本中都未涉及明确的现实政治倾向，而着重凸显“应该作为大众一员发声”或“不能置身事外”的朴素正义感，或仅是单纯转发“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这一标签，表明一个参与态度，而不做更多的解读和延伸。换言之，该事件中大多数明星的参与行动与他

^① 获得2万点赞和近1万条转发，参见：<https://twitter.com/shiikazuo/status/1259094231630483456> [2020-06-01]。

^② 获得4.3万点赞、2.2万条转发，参见：<https://twitter.com/shiikazuo/status/1259096936382001153> [2020-06-01]。

^③ 参见：「検察庁法改正に抗議、ツイッターで470万超、著名人も」、『朝日新聞』2020年5月10日、<https://www.asahi.com/amp/articles/ASN5B34BYN5BUTL005.html> [2020-05-15]；「『#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投稿広がる380万超に」、NHK NEWS WEB、2020年5月10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00510/k10012424081000.html> [2020-05-15]。但结合不同媒体的整体报道内容看，《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NHK更强调明星对大众抗议的推动，而《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则透露出质疑明星的“非专业”和“非理性”的倾向。

的“日常”网络行为和形象保持一致，既要展现一种积极的“责任感”，但又要避免被大众视为一个政治投机的“麻烦制造者”，甚至有明星在参与该话题的同时特别强调自己总的来说“对政治不感兴趣”，以避免影响其大众好感度。^①

由于复杂的动机考量和特殊的身份，明星用户的行为方式和效果不仅扩大了抗议活动的规模，还在“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标签下制造出了新的衍生话题，把不直接关心这一特定议题的大众也吸引到抗议舆论中来。这其中最显著的表现是，由于明星本身是社交媒体焦点且有示范效应，当明星发表推文传播“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标签时，其所获得的支持部分是反映对抗议活动本身的声援，还有一部分则是出自普通人对“明星”作为“非政治专业人士”的政治参与行动的共鸣。但站在抗议活动的反对者一方，由于明星常给人“文化水平有限”的刻板印象，因此为该法案和政府辩护的人常以此为理由宣称活动的“非理性”和“非正当性”。换言之，在明星的参与下，原本针对法案及其程序的赞成与否，就转化为了主张“大众（非专业）”参与和片面强调“专业”参与的两种立场的对立，^②由此在大众——即使不关心该议题本身——中形成一种“被害者意识的共享”^③。

概言之，这一新现象对既有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包括：首先，政治与公共生活中的边缘群体能够对主流议题发声，是基于日常深入参与网络生活获得的反向优势；其次，不同类型参与者在事件中的角色分配和发挥的作用是由他们在社交媒体环境而不是现实政治环境中的位置决定的；最后，核心参与群体间有着组织和动机上的巨大差异，因此他们之间的互动只能结成一个分享原则性和政治情感的松散同盟，不可能形成传统意义上可持续的“共斗”，因此未来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潜力较小。

三、“独立”后的“依附”：传统政治决策过程对网络舆论的回应与吸纳

如前所述，在“#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事件中，社交媒体直接渗透进传

① 值得注意的是，的确有明星在日常活动中就有意识地将社交媒体作为其参与政治的平台，但此类明星的数量和影响力都极为有限。

② 例如，一位右翼评论人士指责某歌手“作为歌手，（对问题）没什么认识……（而传播）‘阴谋论’”，而该歌手回应道，“‘作为歌手没什么认识’这种说法相当没礼貌”。后者受到了众多用户支持（后来该歌手因其推文下的网友评论争吵过于激烈而将其删除）。

③ 安倍龍太郎・荒ちひる・斉藤佑介「ツイッター世論、うねりを生んだ『被害者意識の共有』」、『朝日新聞』2020年5月20日。

统政治决策过程的是一套独立的议程内容，对政治决策构成了外部压力。而这套内容背后的推动力，是政治边缘群体借助网络赋权，从各自的动机和行为习惯出发，通过无组织的互动形成一个松散的情感联盟。这基本符合目前全球社交媒体政治的一般性特征，将来新的舆论压力还会被持续地生产出来，社交媒体“事件”被一再复制的可能性极大。

不过，进一步考察从网络舆论“爆发”到实际政策变更之间的过程，我们又发现，这一来自传统政治决策过程之外的舆论压力，又是被传统的政治决策参与群体有选择回应和吸纳后才发生作用的。从时间线上看，从网络舆论大爆发（2020年5月10日到11日）到内阁最终宣布延迟表决“检察厅法修正案”（5月18日），这期间有一个主流政治决策过程参与者内部不断分化博弈的线索（参见表3）。

表3 网络舆论爆发后传统政治决策参与者的动向

时 间	事 件
5月9—11日	进步系在野党参与网络抗议
5月11日	立宪民主党代表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质疑自民党借新冠肺炎疫情“乘火打劫”，首相予以否定；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再次反对‘检察厅法’部分修正的会长声明”
5月11—12日	石破茂等自民党内“少数派”表示应该“回应民意”；执政联盟公明党代表发表推文表示：“政府应加强对法案的说明”；维新会成员认为鉴于“舆论反应强烈”，应把检察厅法修正的审议从国家公务员法修正程序中分离出去（后因自民党拒绝，维新会收回了这一表态）
5月12日	安倍晋三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示政府不会对网络意见发表评论；《朝日新闻》报道称政府内部在质疑网络舆论规模的真实性
5月13日	内阁相关责任人在国会展开辩护说明，表示“未违背三权分立（原则）”
5月13日	自民党议员泉田裕彦发表推文表示，若本党继续强行表决将考虑退席。该文在推特上获得一致赞誉，而自民党干部表示“会予以处分”
5月14日	安倍晋三在记者会上表示“并无恣意妄为的人事行为”
5月15日	松尾邦弘原检察总长等退休检察官向法务省提交反对意见书，其中核心人物都有洛克希德案搜查经验；在野四党国会对策委员会委员长举行会谈，表示如果执政党强行表决则会抗争到底，可能发起不信任案；安倍在右翼知识分子樱井良子的网络节目上，自辩称没有介入检查总长的人事安排，认为网络舆论只是“印象操作”，并以集体自卫权解禁为例，表达要通过法案的决心；部分现役法官借助媒体展开公开批判
5月16日	石破茂发言表示“民意通过具体数字体现”
5月17日	《朝日新闻》紧急舆论调查显示内阁支持率显著下滑至33%
5月18日	自民党表示放弃在春季国会就“国家公务员法修正案”表决；菅义伟表示延迟表决不影响黑川弘务的人事任命
5月19日	法务大臣在记者会上表示，要尽快阐明延迟退休的基准，向国民说明修正的必要性
5月20日	《周刊文春》突然报道黑川弘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赌博”丑闻，数日后黑川提前辞职

资料来源：根据NHK和日本四大全国性报纸的报道整理制表。

由上可见,“#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舆论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并不是“民意压力”直接改变内阁政策的理想型机制,而是舆论影响政策参与者,由政策参与者再向政府施压的博弈过程。一方面,由于“#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事件发生的意外性和规模巨大性,迫使传统政策参与者不得不做出反应,通过激发出这些传统参与者的新行动最终改变了政策。另一方面,当社交媒体舆论被传统政策参与者回应的时候,它只是被当作一个面目模糊的“民意压力”纳入政治决策过程中,作为传统政策参与者间博弈的客观资源,而推动社交媒体舆论框架形成的边缘群体的具体动机和情感的表达在此过程中是缺席的。

具体来说,首先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网络“民意”没有直接改变内阁的态度。尽管5月11日“民意”已经足够汹涌,但自民党和内阁显然没有准备“妥协”,并且准备了多重的防御手段。最初他们认为舆论本身并不代表“民意”,故表态拒绝接受舆论中的指控,强调用“理性”对抗民众的“情绪”,安倍晋三更是以集体自卫权解禁的先例来鼓舞自民党的支持者,直到5月18日才最终选择妥协。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政策参与者不断加入反对内阁的力量中,从进步系在野党的积极参与,到执政联盟内部出现问责和分化,再到检察官官僚系统的介入。就此而言,内阁的态度变化直接回应的是反对者不断增加的趋势及其对政权稳定性带来的潜在影响,而非网络“民意”本身。

其次,内阁之所以同时面临来自多个政策参与群体的压力,是因为达到“爆炸”规模的网络舆论决定性地激化了这些群体与内阁间的矛盾,使分歧在极短时间内一起涌现出来,令执政党无法再进行内部协调。一方面,在安倍晋三长期执政下,“安倍一强”支配体制色彩突出,不但进步系在野党的政治抗议往往失效,执政联盟成员、执政党内各派、官僚系统及各主要经济和社会团体对内阁的制衡能力也趋于弱化,传统政策参与者对现行体制或许均抱有不同程度的不满。另一方面,政策参与者各自的议程重点、动机和诉求并不相同,无法采取统一步调,这就为安倍内阁提供了分化、协调和博弈的行动空间。例如,在“#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事件爆发前,媒体曝光了“赏樱会”事件,其问题严重性、持续时间和媒体报道的热度在理论上都远甚“#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事件,却未能迫使内阁做出公开妥协。而在此事件中,网络民意在极短时间内爆发的汹涌能量,迫使各政策参与群体既要避免自己成为网络舆论所针对的对象,又要建立积极回应民意的正面形象,从而使他们在较短时间内纷纷选择对内阁施压。例如,公明党代表在5月12日发表推文表示“政府应更好地向民众解释”,这一“中性”的表态立刻引发网民激烈的批判,甚至有公明党的支持

者宣称转向，迫使公明党随后对内阁做出更强硬的反对姿态。

最后，尽管社交媒体舆论迫使传统政策参与者在短时间内迅速回应，并采取对内阁的强硬态度，但这些政策参与者仅仅是吸纳舆论作为与“安倍一强”支配体制博弈的强大资源，其行动方式依然是遵循程序理性和协调制衡的逻辑，同时具有排除网络舆论的斗争性的倾向。从最后的结果看，“检察厅法修正案”固然得以延迟表决，但自民党及其联盟在国会的优势决定了法案的修正仍可能难以避免，当网络抗议浪潮恢复平静后，传统政策参与者失去了行动的紧迫性，注意力自然也可能随之转移。而黑川弘务因赌博丑闻被曝光而提前离职，也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舆论继续发酵。可以说该事件的解决是传统政策参与群体内部妥协的结果，在正面舞台上，非政治群体是缺席的。

四、结 论

从“#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事件可以看出，日本社交媒体舆论已渗透到政治决策过程中。首先，社交媒体舆论形成自身的独立议程内容，迫使传统政策参与者做出回应。其次，这个独立议程不是某个有组织的主体有意识地生产（produce）出来的，而是在多个深度参与网络生活的政治边缘/非政治群体的无组织互动中出现（emerge）的，这些群体在情感化导向的议程内容下结成一个临时又松散的行动联盟。此事件中舆论的“一边倒”与“社会运动的组织性很差”形成了显著对应，说明“决定一个运动发展的往往不是运动积极分子的话语和行动，而是大众头脑中普遍存在的基于社会文化传统的一些基本解读模式”。^①最后，这种基于社交媒体的抗议活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充分吸纳动机和利益不尽相同的各类群体，迅速地形成爆发性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缺乏组织性和有意识的行动纲领的松散联盟本身却很难直接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中。其结果是，传统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参与者被迫回应和吸收了“民意”压力，将其作为彼此间重新分配力量进行博弈的资源，最终导致了政策的改变，但就目前案例而言并未见传统政治决策机制的本质性改变。

“#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事件反映出的社交媒体对政治决策过程的渗透，一方面表明社交媒体这一客观技术环境确实正在影响着当代日本的政治决策过程，但另一方面，就国际比较而言，社交媒体对日本政治决策过程的渗透

^①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28页。

效果还不够显著。在某些发展中地区，网络政治活动甚至直接导致政治对社会失控。而在一些发达国家，网络民粹主义也有直接冲击传统政治舆论框架的实例。而且，“#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事件的规模和效果还受到若干客观条件的约束。例如，安倍长期政权下其他政策参与者不满情绪的积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民众积郁情绪的转移，都是导致这一事件爆发的客观要素。因此，该事件的规模和效果是否能够被复制，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譬如，从2020年10月开始，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抗议菅义伟政府干预“日本学术会议”人事安排的活动，但其冲击性就远不如“#抗议检察厅法修正案”事件强烈。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次事件是针对保守政府的抗议，但并不意味着社交媒体就是站在进步系政治力量一边的，其中所体现出的情感导向、松散联盟等特征，其实同样也曾在有利于自民党的右翼网络议程中有所表现。^①换言之，社交媒体环境的渗透影响对“进步”和“保守”议题同样适用，因此我们关注网络环境的作用，并不能只着眼于它对某种特殊议题的作用，而应从整个政治生态的角度看它的影响。更进一步而言，社交媒体话题的“爆炸式”传播是否就意味着民主的增强呢？这也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与此同时，如何更深入地认识网络舆论的本土化发生机制，如何对待利用网络的边缘群体，如何应对网络事件的突发性，都是现代政治体制无法绕开的课题。

The Penetrating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the Political Decision - making Process in Japan: Based on the Issue of “#Protest against the Amendment of the Law of the Public Prosecutor’s Office”

Pan Nini

In May 2020, a political public opinion event on social media “Twitter Japan”, with the theme of protesting against the amendment of the Law of the Public Prosecutor’s Office, affected the direction of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reflected the penetrating impact of the social media on the political decision - making process in Japan. That penetrating impact also shows the

^① 限于篇幅无法展开，具体可参见：Fabian Schäfer, Stefan Evert and Philipp Heinrich, “Japan’s 2014 General Election: Political Bots, Right - Wing Internet Activism, and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s Hidden Nationalist Agenda”, *Big Data*, Vol. 5, No. 4, 2017, pp. 204 - 309; ロバート・ファーヒ、「SNSデータから『有権者の本音』を推論できるか? —2017年総選挙を事例に—」、『よろん』2019年第123巻、65—70頁。笔者也曾尝试分析相关案例，参见潘妮妮：《试析日本的“网络右翼”》，《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6期，第64—79页；《“保守御宅族”的炼成：亚文化、政治策略与互联网的交互——一个“民意”分析的中观视角》，《日本学刊》2016年第5期，第83—105页。

independence and dependence of the political opinion of Japanese social media, with the independence referr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content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deviates from the normative agenda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its emotional orientation conflicts with the procedural rational orientation attached to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public opinion on the internet is a temporary and loose group formed by multiple marginalized political or non-political groups. Meanwhile, the dependence of the political opinion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although the public opinion on the internet has led to policy changes, it is not the decision-makers who directly respond to the public opinion but the public opinion pressure has intensified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articipating groups in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 coexistence of independence and dependence indicates that the social media has not yet formed a structural challenge to the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Japan, however, it will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uncertainty in the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ソーシャルメディアの政策決定プロセスへの浸透

— 「#検察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のケースを中心に—

潘 妮妮

2020年5月、SNS（ソーシャルメディア）「Twitter Japan（ツイッタージャパン）」上で「#検察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をテーマにした政治的世論に関する出来事が起こった。それは政府の関連政策の方向性に影響を与えただけでなく、ソーシャルメディア環境が日本の政策決定プロセスに浸透していることも示している。この「浸透」は、日本のソーシャルメディアの政治的世論の「独立性」と「依存性」を示している。「独立性」とはネット世論の内容が政党の規範的なアジェンダから逸脱し、感情を主とした意見が政策決定プロセスにおいてこれまで重視されてきた手続きの合理性と相反する一方で、ネット世論の中心的原動力としての多くの政治の周辺にいる人々または政治に無関係な人々との一時的な緩やかな連合がつけられることである。「依存性」とは、ネット世論は政策変更をもたらすが、意思決定者がネット世論に直接反応するのではなく、ネット世論の圧力によって、従来のプロセスに関わる集団の内在的な矛盾が激化し、各勢力の間のバランスに一時に圧力を加えて、最終的に意思決定者に迫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こうした「浸透」における主体性と依存性の共存に示しているのは、ソーシャルメディア環境が日本の政策決定プロセスに構造的な試練をまだもたらしていないが、不確実性を著しく増大させることであろう。

（责任编辑：唐永亮）